



民国大学丛书

多桑蒙古史

DUOSANG MENG GU 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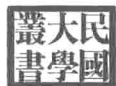
(上)

[瑞典]多桑 著 冯承钧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民国大学丛书

多桑蒙古史

DUOSANG MENG GU SHI

(上)

[瑞典]多桑 著 冯承钧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出版说明

在学术氛围相对开放自由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国化教科书”为鹄的，以“学术独立”为旨归，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陆续规划出版了一系列以“大学丛书”、“大学用书”等命名的著作。这些著作虽名为教科书，但突出的是学术性和专业性，许多著作至今仍是相应学术领域的必读必备之书，就其思想性而言，更有着当今学林难以企及的高度。

且以商务印书馆之“大学丛书”为例。其最为人所瞩目的一大特点即是名家集萃。丛书的编委、作者大多不但学有专精，且学贯中西，如冯友兰、胡适、王云五、李四光、何炳松、马寅初、傅斯年、蔡元培、竺可桢、蒋梦麟、顾颉刚、郑振铎、金岳霖等，可谓极一时之盛。故不管是译著还是编著，俱能保证较高的学术水准。

其特点之二是选题的多元性。不同于今天学术界，尤其是教育界指导思想自上而下的整齐贯一，民国时期推崇的是学术自由，包涵万流。如同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与钱穆的著作就各有千秋，甚至钱穆的很多观点就是针对梁启超而言的。再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观念更是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大相径庭。不同观念、不同流派、不同思想的著作俱为同一“大学丛书”所收录，并由全国各大高校师生自由选择，这本身就是学术自由的一种最直观的体现。只有传道授业者拥有了这种得以在大学课堂上传播一见一得的自由，才有可能建成“大学之为大”的理想高校，培养出“独立之精神”的一流人才。盖

民国大学之辉煌，正在于此。

正因为“大学丛书”等一系列著作对中国学术文化及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别意义和重大影响，自上个世纪出版发行以来，始终备受各界学人和普通读者的推崇喜爱，即便是于战火之中，亦屡有重印。然至今时今日，“大学丛书”中虽有部分名家名著零散出版，却不成系统，拣选不易，甚或有明珠蒙尘，一般学子遍寻不得者。有感于此，我们重新编辑出版了这套民国大学丛书。

此次重编民国大学丛书，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大学丛书”，中华书局出版之“大学用书”，以及上海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中国大学丛书”基础上，融入了北京大学丛书、清华大学丛书、中山大学丛书、东南大学丛书等民国著名高校名师课程讲义而成。丛书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担纲选目，既可再现民国大学学术繁荣之盛景，又可为今日之大学学科建设服务。

我们希望，这套民国大学丛书能对广大青年学子拓展知识视野，培养独立人格有所裨益。

我们更希望，这套民国大学丛书能对诸多大学的学科建设、教育理念及学术精神有所启发。

东方出版社

2012年5月

前 言

多桑（C. d'Ohsson）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家，1780 年生于君士坦丁堡，历任瑞典的外交官，1855 年死在柏林。他精通突厥、阿剌伯、波斯及西方诸国的语文。这部《蒙古史》是用法文撰写的。著者凭借他的丰富的语文的知识，参用了大量的阿剌伯文和波斯文的史料，对蒙古民族在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活动史实作出了详细的叙述。全书出版（第一册 1824 年初版，全书四册，1852 年出齐再版）以后，欧西各国盛行一时，获得了资产阶级历史学界很高的评价，并为中西学者所广泛使用。

关于中国蒙古王朝——元代——的历史，我国有着极其丰富的文献史籍。《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和明代官修的《元史》，都是研究蒙古史的头等史料，其中《元史》更是记载蒙古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的最详尽的巨著。这些史料早已为中西学者所重视。但是，十三、十四世纪蒙古民族活动的历史有着世界性的意义，他们不仅统一了全中国，并且还远远地向西方发展，达到东欧各地，建立了察合台、钦察、伊儿三大汗国，给予这些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以极大的影响。因此，全面地了解和研究我国元代和蒙古民族活动的历史，西方文献的参考是十分必要的。多桑的这部书以及这部书中所引用的著作，如刺失德、朮外尼和瓦撒夫的书，都是值得参考的资料。

这里应该指出，多桑的《蒙古史》是有很大的缺点的，除了译者在序言内指出的史料编纂方面的错误和疏漏之外，主要的还是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共有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它只是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一些历史事实，而对于这些历史事实却没有也不可能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判。但多桑这部书，正如冯承钧先生在序文中所说的，在刺失德的《史集》以及其他波斯、阿剌伯文的许多著作没有译出以前，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有用的史料。今天我们重印这部书的原因也就在此。

多桑的书卷帙颇巨，出版百余年来，全部译成东方文字的只有冯承钧先生的汉译本。日本田中萃一郎的日译本，仅完成了前三编。冯先生翻译此书，因为上下两册分期译完，有些译名未能统一，他生前提起，每引为憾事。中华书局要求将先生的译本整理重印，为了便利读者，我就本着先生生前的愿望，除

多桑蒙古史

了将两册的译名尽量力求一致以外，并在后面增添了译名对照等表。在今天中亚史料未能大量译出之前，我想对于研究蒙古历史的人，这部书会有一定的帮助。

陆峻岭 1958 年 9 月于北京

译序（一）^①

一部《元史》，历来囿于“正史”成见的人皆说不好，所以陆续改编了些《续编》《类编》《新编》《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这部历史好像是犁然大备，其实不然。修史首重在搜辑史料，而修《元史》尤须要通晓几种外国语言；不解外国语言，不但不能搜辑外国史料，而且不能解释本国史料。更有进者，外国语言不可偏重一种，《译文证补》就犯这种毛病。此书虽然引用了许多“西域书目”，好像他是全凭译人口述而“笔受”的。不仅未见波斯语、阿剌伯语种种撰述，而且多桑的书好像也是从霍渥儿特（Howorte）书转录的。洪氏证补《元史》之功固不可没，可是他有一种成见误人不浅，他说西方语言无某音，不及汉字译音之备，此说很不可解。若说用标音字母译写的名称，不及音义有变化的汉字之备，未免很奇。他在《译文证补》里面，根据译人的口述，改了许多《元史》固有的地名人名，比方《元史》译 Heri 作也里，《元朝秘史》作亦鲁，皆有译例可寻，可是洪氏根据晚见的 Herat 译作海拉脱，似乎只知其一不知有二了。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他这种创译，苦了后来续修《元史》的人。所以《新元史》的阿儿浑，在此人本传中作阿儿浑，而在《旭烈兀传》同《西域传》中又作阿儿衮，这种毛病皆是不能径读西书所致。

所以我想将多桑这部《蒙古史》翻译出来，此书出版虽已有一百多年，然而研究蒙古史的人，仍不能不拿来参考，因为《世界侵略者传》《史集》、瓦撒夫书等书没有完全译本以前，终不能不取材于是书。案：多桑书共有七卷，前三卷述成吉思汗至元亡时的事迹，后四卷专言伊儿汗国的史事，并附带言及钦察、察合台两汗国。其第一卷业经田中萃一郎译为日文，译文还忠实，可是有许多人名地名未取元代载籍的固有译名比对。第二、第三两卷记成吉思汗以后之事，然多取材于中国史书的译文，所本的汉籍，以《续通鉴纲目》《元史类编》两书为最多，偶亦采用《元史》。然而于《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皆未引用；当然说不上《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同元人文集中的许多碑志、行状、家传了。所以我译此书，先从后四卷译起，将来如有余暇，再译西方材料较多之第二卷。

多桑书所本之书有二三十种，也有人名地名不统一的毛病，尤其使人讨厌的，就是他叠床架屋式的译写方法，然而也无可如何，不使用新式译写方法将他改正。霍渥儿特书第四册的索引译写单简，可以取来对照。

我原想用白话翻译，不用“史书文体”，可是渐渐不知不觉地受了史书文体的支配，然而我始终力避用“典”。我的目的惟在将此书原意译出，供他人作史料参考之用，所以对于译文只求忠实，不去锻炼字句。在别人看起来，我译的这部书或者比从前的译文退步，然而我觉得译文通畅的地方，容或有点削足适履；文义涩滞的地方，容或确可比对原文；所以宁愿拖泥带水，而不愿钩章棘句。

从前编纂《元史》的人，除开屠寄以外，皆有译名不一贯之病；所以我在翻译中，对于人名地名，颇为审慎。凡人名地名皆以《元史》《元秘史》两书为主，两书所有的，选用一名。两书所无的，地名一项，尽先采用唐、宋、明人的译名；人名一项，元代载籍中有同名的，如帖木儿、不花、阿里、忽都不丁、阿合马、亦思马因、阿老瓦丁、马合谋之类，虽非本人，亦用旧译。元代载籍中无可比附的，则务求合乎元人的译法，不敢以今人的读音，认作元人的读音。元人的译法在不明语学的人看起来，好像不对，比方将-l 读作-n，就是一个例子。殊不知这种代替方法，从前也有，而在元代竟成一种通例，所以译 sultan 作算端，Djelal-ud-din 作札阑丁，Ilitchikadaï 作宴只吉带。这皆是翻译本书所用的正例，然而有时因为下述种种理由，不能不用变例。

元代除开一个最短期间用八思巴字母外，始终用的是畏吾儿字母。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 g-、h 的字母，所以蒙古文中多缺此种写法。唐时突厥语的莫贺咄，移植到蒙古语中，应读若 bagatur，可是在蒙文《元秘史》中写作把阿秃儿，则成 ba'atur；在《元史》中更简作拔都鲁，则成 batur。又一方面，阿剌伯字母中不常著录韵母，所以有许多名称写法不一，姑就此把阿秃儿一字而言，本书竟有写作 Behadir 者，我当然不能按着字面翻译，而将他改作八哈都儿。此变例一。

伊斯兰教人的名称，无所谓姓，加之名字相同，要使许多同名的人有别，所以在名后加一别号，如用职务官称之类；再不能判别，则于名后注某人之子，如 Ibn Ali，犹言阿里之子之类；或者还要加上一个地名，如报达人，朮外因（就是《译文证补》的志费尼）人之类。然而也有无从判别的，所以我将这类的译名，略为变通。如《元史》中的 Argoun，是种族名，是军名，亦是人名，《元史》为判别这些名称，将他写作阿儿浑、阿鲁浑、阿里浑、阿剌浑几种写法。我也仿照这个例子，皆分别著录原文于下，可是也有不能分别的地方，本卷中有三个秃儿罕可敦（Tourkan Khatoun），究竟是二人是三人，无从知之，此种名称只好用一贯的译法。此变例二。

本卷中有些译名，看起来好像是变例，其实是正例。比方钦察汗国侵入波斯的统将名唤 Nogai，《译文证补》将此名译作诺垓，其实此名也是蒙古时代的一个通常名称，与他同名的人，在《元史》中颇不少见。我们姑将《元史》的译例来解说。《元史》（我所指的当然是未遭乾隆校刊劫的《元史》）定宗后名唤斡兀立

海迷失，就是西书的 Ogoul Gaimisch，可见海字对 gai。蒙古人的官号 Noyan，在《元史》中写作那颜、那演、那衍，可见那字在元时读若 no，对照起来，Nogai 应该译作那海，而不应改作诺垓，这类例子很多，姑举其一，以概其余。

还有些译名，可以说是正例，也可以说是变例。旭烈兀有个儿子，在此书中（第五卷）写作 Councouratai，《译文证补·阿八哈补传》写作空库斡台，《蒙兀儿史记·世系表》作空古斡台，《新元史·旭烈兀传》作空古斡儿，然在《台古塔儿传》又作康廓而拉台，其实皆被多桑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所误。案：元代的蒙古人，常用些部族名称作人名，仅在后面加上一个接尾词，大概男名加“台”，女名加“真”。这些用部族名称而自名的人，并不是本部族的人，比方南家台或囊加歹，并不是中国南方的人，马札儿台也不是匈牙利人，乃蛮台也不是乃蛮人，不过取其名而已。此处的 Councouratai 也是此例。多桑所取的材料来源不同，写法因之有异，其第一卷后附注所引《史集》诸部族名，有 Cuncarat，就是此人名之所本，也就是《元史》所常写着的弘吉剌，此名在《辍耕录》中作瓮吉剌，在《辽史》《金史》中作王纪剌、广吉剌，用新式写法，应作 Qongirat 或 Ongirat。头一字何以有时用声母，有时不用声母，我现在还不能答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拿畏吾儿字母来解释，因为辽金时代蒙古人还未用畏吾儿字母，可是第二个字的韵母在汉译皆用 -i，所以我将这个人名更正为弘吉剌台，这个译名初视之好像未遵原文，其实我有我的理由。

本书有若干地名，我明知有误，然而未能确证其误以前，只好随他。比方旭烈兀进攻木剌夷时，有个地名作 Khar，按照霍渥儿特《蒙古史》所引 Quatremère 译本《史集》，此地名是 Khowar，则即是《元史·西北地附录》之胡瓦耳。然而我不敢改正，仍然译作哈儿。又如本书中之若干地名，似乎应该“名从主人”，不应用欧洲语言的名称。比方埃及不应名曰埃及，而应名曰密昔儿（Misr）；美索波塔米亚（Mésopotamie）应改作 Djézireh。可是我是译书，而不是在考订，所以也不便改他。然而有时也有点变例。阿剌伯语名阿母河曰 Djihoun，此河元代本有阿梅、阿母、暗木等译，所以我习用旧称，不用新译。本书称阿母河以外的地方曰 Transoxiane，原意犹言“乌浒水外”，译用这个名称，未免太僻；若用康居的名称，未免太古。元时在此地设阿母行省，可是这个行省所管的区域，好像在最初时西及波斯，东兼《元史·西北地附录》之途鲁吉（Turki），不能将这个名称代表两河之间的地域。考此地阿剌伯语之原名作 Maveraun Nehr，此言河中，西辽时于其地置河中府（见《湛然居士集》及《西游记》）。我所以将此地译作河中，其地既在西域，决不致同蒲州发生混解。

译名一贯之重要，取下面所引的一段《新元史》观之，就可知道了。《新元史》卷 256（12 页）云：“西里亚，埃及属国，以他木古斯为都城，埃及与蒙古

隔绝不通使命。宪宗初，西里亚酋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取埃及之塔木司古司之地，后为埃及苏而滩哀倍克所败，纳昔儿乃割基纳斯列母克渣及纳蒲列斯海岸以请平。”案：此处的他木古斯同塔木司古司，明明是一个地方，不知为何用两个译名。此城就是我所翻译的大马司。此城古称同现在英文仍旧袭用的名称，固是Damascus，然而我只能从原书法文名称之Damas而译作大马司。《新元史》的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就是多桑书的Nassir Salah ud-din Youssouf，我翻译的纳昔儿撒刺丁亦速甫。《新元史》的译法，除开“商”字外，尚可勉强对付，可是后面的“基纳斯列母”，要叫元朝的人读起来，势须作kinasremou，同多桑书的Jérusalem未免相去太远了。况且这是基督教人的圣地，通常译作耶路撒冷者，不知为何发生这样的讹译，大约是翻译的人太无史地常识，而撰修的人未能校对原文所致。由这一方面看起来，可见修《元史》不仅仅要通晓与《元史》有关系的若干语言，而且还要抛弃汉字古今读音不变的成见。其实我于此道不敢自认高明，我原想等待伯希和所译写的蒙古文《元朝秘史》刊行后，考究元代的读音，再就考究的结果，来整理元代载籍的译名。那晓得等待了十四年，除开片段的发表外，全书尚未出版，所以于译此书时，不敢自认译音之必是，将所有的人名地名皆附注原文于下；然不能遍注，只以初见者为限。有时一名两三注者，或因原名有详有略，或因一名写法两歧，或因前后文相距太远，所以一再著录。

读者还要注意的，不仅多桑书所著录的名称不一致，或有误写而必须考订的地方，而且他所本的史料，也不免讹夺。现在姑举一例来说，《史集》记载从大都赶上都的道路有三，第二路经过一城名曰Djodjou，此城附近别有一城名曰Simali，后一个名称就是长城附近的洗马林堡。可是Klaproth, Yule, Blochet诸人皆说前一地是涿州，在音的方面固然可以将就，在地理方面可就难了。现在从燕京到多伦西北八十里之古开平府，何至于假道燕京西南一百几十里的涿州，足证刺失德(Raschid)书传抄有误。伯希和在《亚洲报》(1927年刊)说是抚州之误，这种考订是不错的。可见不仅读多桑书要审慎，就是读他所本诸书的原文或译文，也要审慎。本卷中所言的狮符，明明是虎符之误，新修《元史》的人过于重视西方载籍，常将虎符改作狮符，然则《元史·兵志》“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的记载，竟成狗矢了。

1933年6月1日冯承钧识

注 释

① 这原是本书下册的译序。后面的一篇原是上册的译序。

译序（二）

多桑书共有七卷。我前以为西域三大汗国的史事，在旧籍中颇欠缺，在新编中亦多疏误，故先将后四卷译。后来看见田中萃一郎所译的前三卷，我又觉得全书仍有翻译之必要（田中的译文我在《大公报》图书副刊第十四期中已有评），遂又将前三卷转为汉文。翻译时间既有先后，前三卷同后四卷的译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比方 Mohammed 先译作漠罕默德，后在前三卷中概从唐译作摩诃末，就是一个例子。全书译竣，我想将后四卷取回整理，不意原稿清样统已制成纸型，势须大加挖改，末后只好听他。前三卷有新式标点，后四卷无，也是因为这种关系。^①

我从前在第四卷序中说过，多桑书同《元史》一样，也有译名不一贯的毛病。因为他所本的伊斯兰教撰述，文字不著韵母，而声母音点有时脱落，常易相混，所以不特相近的韵母有时误用，甚至难于互用的韵母，也能混淆不分。声母之误如果无他书可以对勘，竟至无法考订。比方主儿勤之误作 Bourkines，错了一个声母，那牙勤误作 Boucakines，竟错了两个声母，一个韵母。他最使我感困难的，就是对于 c, k, g, kh, gh 等声母毫无分别，例如他译写的 gan，对音可作干 (gan)，又可作坚 (gān)，且可作罕 (ghan, khan)。这种困难有时还可以用前后文去补救，例如 Togan，不难认识是脱欢。可是他有时又将 o 同 ou 两个韵母互用，写作 Tougan，则未免使人犹豫不决，因为蒙古人也有名唤秃坚的。像这一类的困难不计其数，我自信尚未能完全将他解决。

此外有些译名，好像与对音未合，其实不然。我在第四卷序中曾引证过若干变例，比方将 -l 读作 -n，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 g, gh 等声的字母，就是两个大变例。此外尚有若干为前序所未及的，条列如下：

突厥语发音之 y，在蒙古语中常变作 j。比方突厥语驿站作 yam，蒙古语改作 jam。突厥语法令作 yasaq，蒙古语则改作札撒黑 (jasaq)。讹答刺城的守将，杀成吉思汗使者的那个人，刺失德书名亦纳勒出黑 (Yinalčuq)，号哈亦儿汗 (Qayirkhan)，而在《元史》则作哈只儿只兰秃 (Qajir-Jinaltuq)。除以蒙古语语尾之 -tuq 替代突厥语语尾之 -čuq 外，两个 y 皆变作 j，一个 l 变作 n。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蒙古语同西域语常将 b 变作 m，若乞卜察黑 (Qibčaq) 之变作钦察 (Qimcaq)，哈卜哈纳思 (Qabqanas) 之变作慈哈纳思 (Qamqanas)，是两个很明显的例子。

蒙古语对于发音之 r，常叠用其后之韵母，比方 Ros 之作斡罗思 (Oros)，Ri-

azan 之作也烈赞 (Äräzan), 也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这种译法同古译相反, 比方《宋高僧传》卷三有阿儺真那 (Ratnacina), 竟将发音的 R-简单删了, 大约是汉语同蒙古语无此发音, 所以读音或增或减。

发音之 A-有时省略, 比方 Abu Saïd 之作不赛因, Abu Bâkr 之作不别, 是见于《元史》的变例。可是也有帖木儿的后人 Abu Saïd 在《明史》中写作卜撒因的。看这个例子, 足见收声之-d 偶亦变作-n。但是这种变例的收声不常见。

蒙古语尾之-n 增删无常。若阿勒赤 (Alči) 亦作按陈 (Alčīn), 河西转为合失 (Qaši), 也可变作合申 (Qašin), 月忽难 (Yohunan) 又可作月合乃 (Yohunai), 这个月合乃在《元史》卷 134 误作月乃合, 诸本《元史》皆然, 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实作月合乃, 这个名称大概也是从突厥语转贩而来的, 在蒙古语中则变作朮忽难 (Juqunan)。

蒙古语常读 t 作 d, 比方将 tarqan 读作答剌罕, 将 taïr 读作答亦儿, 就是两个很明显的例子。这种读法好像不是蒙古语所独有的, 从前汉译 tarqan 曾作达干, Turküt 曾作突厥。

上面所说这些变例, 不但是译多桑书所应知道的, 就是读《元史》也是应该知道的。至若我所用以译写的汉字, 我很想适合当时的读音。因为翻译非汉语的人名, 固然要求一贯, 可也要注意当时的读法。我曾说过, 如要整理《元史》译名, 必须具备几种条件: (一) 要名从主人; (二) 要了解西方北方几种语言; (三) 要明白汉字的古读, 尤要知道元人的读法。从前整理《元史》的人, 好像多未具备这三个条件, 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离不明。比较以前的整部成绩, 只有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微合第二第三条件, 可是他常将《元朝秘史》的译音译写近代西方地名: 将契丹改作乞坛 (Qitan), 还可以说是乞塔惕 (Qitat) 的单数; 将波斯作珀儿昔阿 (Persia), 也可勉强对付; 可是将埃及作额只魄惕 (Egypte), 而不用名从主人之例, 作密昔儿 (Misr) 等类的译法, 未免过于刻舟求剑了。但是比较其他改修的《元史》, 总算强多了。在学界种毒最深的, 要首数《元史译文证补》的译名。洪氏丝毫不问上述的三个条件, 同元代译名的那些变例, 对于《元史》名称妄加改窜: 比方译 Catchoun 作哈准, 而不用元译的合赤温或哈赤温; 译 Noqai 作诺垓, 而不用《元史》屡见不鲜的那海或那怀, 自以为新, 其实错了。古人翻译, 很明了汉字的读音, 比方《圣武亲征录》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将, 译名作三木合拔都, 后又作三合拔都, 此人的原名是 Samuqa Ba'atur, 翻译的人用“三”(古读 sam, 今粤人尚作此古读), 照顾到第二个字的发声。这种译法就是从前佛经的译法, 也就是《元朝秘史》的译法, 不像今人随便用本人乡土的方言, 同似识非识的汉字, 译写外国语言名词之乱。所以《元史》中的译名虽不统一, 除开过于省译之名称外, 皆不难复其原名。至若《元史

译文证补》一直到《新元史》的译名，能够还原的恐怕很少。

我所用的标准译字，多从《元朝秘史》，然而并不认定《元朝秘史》是一部完全不误的译文，其中也有些传写的错误。比方将你沙不儿（Nisabur）写作亦薛不儿（Isäbur），将亦剌合（Ilqa, Ilaqa）写作你勒合（Nilqa），可以说是音点不明，致有此误。可是杀乃蛮王子古出鲁克（屈出律）的地方作撒里黑昆（Sariqqun），证以近来发现的蒙文《秘史》残本，实是撒里黑豁勒（Sariq-ğol）之误。如此改正方与蒲犁县之土名相合。这类版本的错误，《秘史》中尚有不少，所以我虽采用此书，可不绝对盲从。

旧译名除开过于省译的名称，像忽亦勒答儿（Quıldar）《元史》作畏答儿的例子外，我皆尽量采用，决不自出心裁，妄易新翻。元代载籍所无之人名地名，而有旧译者，则用元代前后之古翻，如隋唐之范延，《明史》之帖必力思之类，亦不别用新名，不用今读之字译古名，也不用古读之字译今名。凡原名初见者，皆附西文原名于下。可是对于多桑书所采乾隆时妄改的名称，根本既有错误，西文译写之名除不误者外，概从删弃。好在多桑书的精华全在伊斯兰教著作，他所转贩的那些汉籍副料（以《续通鉴纲目》为最多），应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整理。

多桑书所引刺失德书很多，而刺失德书同《圣武亲征录》并出一源。在刺失德书未直接转为汉语以前，我觉得多桑书是一部很好的参考史料。比方《亲征录》所载木华黎率王孤、火朱勒、忙兀、弘吉剌、亦乞剌五部，以及契丹、女真之兵南侵中国一文，其中的火朱勒部，久之未详其对音为何，今观多桑书，知为Qoşıqol。然则《亲征录》原译或是火失火勒矣。刺失德书（Berezin 本数见此名）说是每十人队中挑选二人组织成的军队，此说颇类真相，因为此字的字根是qos，突厥语犹言双也。此姑就以多桑书校正中国史录而言。反一方面说，也可取中国史料校正多桑书。兹举一例为证：多桑书第一卷第二章有个部落，名称曰亦勒秃儿斤（Ilturkine），后在附录中亚部族表中，又作亦勒都儿斤（Ildurkine），检《元朝秘史》卷六相对之文（叶本31页），王罕有个使臣名亦都儿坚（Idurgän），后（49页）同一人又作亦秃儿坚（Iturgän），也是一名两种写法，姑不问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要可以《元朝秘史》的名称改正多桑书之误。

我译多桑书时，很想做一种互证的工作，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可是费时也很久。如此做下去，恐怕几年也译不完，后来只好译而少证。

我在本序中所用的译写方法，除引用多桑原文外，皆用新法。因为多桑书的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太累赘，并可发生误会。比方谷儿只王 Lascha，《蒙兀儿史记·西域传》误读作辣思伽，其实应作刺沙（承袭此人王位的鲁速丹，就是刺沙之妹，然而新修的《元史》迄未认清是何人，《蒙兀儿史记》误作刺沙之甥女，《新元史》误作刺沙之弟妇，大约是习于中国观念，以为只有弟媳摄政，那有姑奶

奶当权，是不特不明西史，而且并 Howorth 《蒙古史》的世系表亦未寓目）。若是用新法写作 Laša，就不致于发生这类的误读了。我译多桑书常想将他的译名修改。可是他的写法无一定标准，有许多名称很难判别，末了只好听他，仅在汉译名中略为变通。所以 dji 常译作“赤”，而不作“只”。再者多桑的译名皆作“法语化”，比方蔑儿乞惕已经是蒙古语表示多数的名称了，应该写作 Merkit，可是他写作 Merkites，另外又添了一个法语多数，弄成画蛇添足。要是遇见一个翻译匠，一字一音地当作英文读去，恐怕最博识的考据家也无从考见真相了。这也是读多桑书应该注意的一点。蒙古语表示多数的语尾固然是-t，《元秘史》写作“惕”，可是因为采用别的语言，或因他种原因，有时多数作 s，r，l，《元秘史》写作“思”、“儿”、“勒”。比方南家思（Nankiyas）、速勒都思（Suldus）、巴鲁刺思（Barulas），用“思”而不用“惕”，札刺亦儿（Jalaïr），塔塔儿（Tatar），用“儿”而不加“惕”，撒儿塔兀勒（Sarta'ul 就是回回），用“勒”而不改“惕”，皆可为证。我还疑心有用-n 字作多数的。晃豁坛（Qongotan）的多数固作晃豁塔惕（Qongotat），乞颜（Qiyān）的多数固作乞牙惕（Qiyat），为甚么乃蛮（Naiman）不作乃马惕（Naimat）呢？元代固有乃马台（Naimatai）、乃马真（Naimajin）的人名，这不过是蒙古语变化的属格，不足证明他是多数。检遍《无秘史》，竟未发现乃马惕的写法，不论单数多数，皆作乃蛮。要说乃蛮是数目字（此言八），为甚么朵儿边（Dorbān，此言四，亦是部族名）有朵儿伯惕（Dorbāt）的变化呢？若要解决这个问题，非比较阿勒台（Altaiques）系语言不能得到答解。我所举的这些例子，无非使人知道蒙古语多数不仅用惕，切莫仿效《蒙兀儿史记》，不但将蒙古语的多数一概变作惕，而且将非蒙古语的多数，甚至将梵语的多数，一概变作惕。

我这些批评，并不是在摘人之短而见己长，不过是因为有几部书已经具有“威权”。我译本书撰者 C. d'Ohsson 的名称，不敢规规矩矩译作朵松，而仍用旧译的多桑者，也是受了这种威权的影响。这些具有威权的撰述，不能说全书皆好，当然有些缺陷，我无非指明这点缺陷，使参考的人不致沿袭其误而已。除开此点以外，我以为别烈津本的刺失德书未重译以前，《元史译文证补》一书是可以参考的，《成吉思汗实录》《蒙兀儿史记》二书，也是治元史的人离不开的佳作。

我译此书也不敢说好。从前在评田中所译多桑书一文中，曾经说过：“多桑书中错误散见，欲改之则与原文异，不改则与事实违，无论何人译是书，终不免吃力不讨好。”所以多桑书出版逾百年，尚无一人敢有翻译全部的勇气或傻气。我今竟敢将此书全部转为汉语，只望读者谅我胆量之大，不敢望读者誉我译笔之工。

1934 年 4 月 10 日冯承钧识

注 释

① 此次重印，已将前三卷与后四卷译名加以统一，后四卷也改用了新式标点。

目 录

前 言	1
译 序 (一)	1
译 序 (二)	1

第一卷

绪 言	3
第一章	18
中亚之游牧民族——突厥与鞑靼之古国——其与中国之关系——十三世纪初年之中亚—— 此时代之鞑靼种民族及其所居之地域——其风俗	
第二章	24
蒙古人之古代传说——成吉思汗之祖先——成吉思汗少年时代之事迹——其长数部—— 初诸战——其与克烈汗之关系——克烈部之略志——铁木真与王罕合攻数种游牧民族—— 两王之结怨——铁木真之败——其遣使告克烈汗之语——王罕之败——其死——铁木真之 战胜乃蛮部——乃蛮王之死——蔑儿乞部之降附——塔塔儿部之灭——铁木真之侵入唐兀 ——此国之略志	
第三章	44
大会——铁木真称帝号成吉思汗——二侵唐兀——乞儿吉思与谦谦州之降附——斡亦剌之 降附——讨伐屈出律与脱脱——三侵唐兀——畏吾儿之降附及此民族事略	
第四章	48
成吉思汗之叛金——契丹或辽国——女真或金国——成吉思汗之进兵中国——侵入山西直 隶——金兵之败——辽东契丹之叛附成吉思汗——金国都城之变及金帝允济之被害——其 侄吾睹补之即位——金夏之战——成吉思汗第二次侵入中国——残破山西、直隶、山东等 地——议和——金帝迁都汴京——蒙古军第三次侵入中国——取中都——攻汴京	
第五章	56
成吉思汗之还蒙古——蔑儿乞部之灭——秃马惕部之征服——讨辽东之叛——遣木忽黎总	

统诸军经略中国——四侵唐兀——太阳汗子之走哈刺契丹——此国之沿革——屈出律汗与花刺子模算端之结合共图哈刺契丹帝——屈出律之取哈刺契丹——蒙古军之侵入哈刺契丹国及屈出律之败亡	
第六章	61
花刺子模帝国——历渐强大——算端摩诃末与哈里发纳昔儿之失和——进攻报达——算端诸子之封地——其军队之组合——其母之当权——成吉思汗之遣使传语——至自鞑靼地域的数商人之被杀于讹答刺——成吉思汗之备战——其使臣之被杀——花刺子模、蒙古两军之战于突厥斯单——成吉思汗之进兵花刺子模国——摩诃末之筹备防守	
第七章	71
成吉思汗之至花刺子模边境——河中之侵略——遣军追逐摩诃末——摩诃末之走死阿必思浑岛——其母妻之被俘——其二子之死——花刺子模之侵略——巴达哈伤之降附——拖雷之侵蹙呼罗珊——算端札阑丁之走哥疾宁——其胜蒙古军于八鲁弯——其诸将之离心与大部士卒之携贰——其走申河——成吉思汗进击札阑丁——申河之战——八剌、秃儿台两将之渡申河——哥疾宁之掠杀——也里、马鲁二城之毁灭——札阑丁溃卒之结局——巴里黑之毁灭——成吉思汗之归蒙古	
第八章	95
续志哲别、速不台二将远征之役——残破伊剌克阿只迷、阿哲儿拜占、阿兰三地——败谷儿只人——谷儿只、设里汪两地之抄掠——败阿兰人及勒思吉人——侵入钦察地域——败斡罗思人——残破斡罗思南部——侵入克里米亚半岛——败不里阿耳人——此军之还蒙古——蒙古军之重复残破伊剌克阿只迷	
第九章	103
朮赤之死——侵入唐兀——高丽之降附——木忽黎之经略中国北部——金宋之战——木忽黎之死——其子孛鲁之接统其军——成吉思汗之侵入唐兀——此国之侵略与灭亡——成吉思汗之死——其归葬蒙古	
第十章	110
成吉思汗作战优越之原因——其军队之性质——其军制——其围猎——其法令——其妻妾	
附录一 林木中之兀良哈	118
附录二 中亚诸部族	119
附录三 成吉思汗世系	123
附录四 鞑靼	126
附录五 畏吾儿	127
附录六 哈刺契丹	131
附录七 蒙古军侵略黑海、里海北方诸国之役	133

第二卷

第一章	137
成吉思汗分封土地军队于其亲属——拖雷之监国——大会——窝阔台之被推戴——窝阔台之初政——遣军远征波斯——与金人战——陕西全部之占领——拖雷之远征——其残破四川——其侵入河南南境——窝阔台之渡黄河——两蒙古军之会合——金军之败——汴京之被围——议和——窝阔台、拖雷之还蒙古——速不台之围汴京——解围——汴京之死亡人数——金帝之弃汴京——其渡黄河北岸——其军之败——重渡黄河而走归德府——汴京之第二次被围——崔立之叛——以汴京献速不台——金国帝室之结局——宋人与蒙古结合——宋军之入河南——金帝宁甲速之走蔡州——蒙古军与宋军之会围蔡州——蔡州之攻下——宁甲速之死——其嗣君承麟之被杀——金国之亡	
第二章	147
窝阔台、拖雷之还蒙古——窝阔台之得疾——拖雷之死——大会决定三地远征——哈刺和林城之建筑——任用耶律楚材管理中国财政——分封中原之地于诸亲王妃主——在中国任用士人——为蒙古子弟设置两大学校于中国——高丽之叛服——宋军之侵入河南——崔立之被杀于汴京——宋军之取汴——蒙古军之败宋军——宋军之退——宋之谋和——蒙古对宋宣战——蒙古三军之侵宋——四川之被侵——湖广、江南之役——窝阔台之死——其驻所——其嗜酒——其挥霍——察合台——一伊斯兰教伪教主之创乱于西域河中	
第三章	158
窝勒伽河西诸地之蒙古远征——经略不里阿耳之地——经略钦察之地——经略斡罗思北部——尽降太和岭北诸族——经略斡罗思南部——侵入波兰——里格尼志之战——昔烈西亚及莫刺维亚两地之残破——侵入匈牙利——匈牙利军之败——匈牙利之残破——别刺之逃——阿德里亚迪海滨——蒙古进兵入答勒马惕——其退兵——重再侵入匈牙利及波兰——其统治斡罗思之地	
第四章 贵由时代	174
皇后秃剌乞纳之监国——耶律楚材之死——贵由之被推戴——其在位时之措施——其死——教皇因那曾遣派传教师往使蒙古——教士普兰迦儿宾之赴鞑靼地域——教士安塞勒木之赴波斯——圣鲁意之遣安德烈隆主麦勒往使鞑靼地域	
第五章 蒙哥时代	185
皇后斡兀立海迷失之摄政——第一次大会之推戴蒙哥——帝位由窝阔台系移转于拖雷系蒙哥之当选——窝阔台诸孙之反对——所谓阴谋之发现——党于窝阔台系者之被惩罚——任命诸要职——创设佛教教主——定丁税——莎儿合黑帖泥之死——皇后斡兀立海迷失之被害——窝阔台系诸王之遣谪及其部众之被夺——逮治全国之党于窝阔台系者——畏吾儿王之被杀——命皇弟忽必烈领治汉地民户——窝阔台死后对宋之用兵——遣军往讨高丽——命皇弟旭烈兀西征波斯——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之侵略北印度	